

王晓纯 吴晚云 主编

N

e

w

H

n

B

a

n

i

t

i

e

s

S

e

r

i

e

s

no.01

新人文
丛书

文化无非你和我

史仲文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Culture Revealed in Life

文化无非你和我

史仲文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S

no.01
新人文
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无非你和我 / 史仲文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新人文丛书)

ISBN 978-7-5133-1033-8

I. ①文… II. ①史… III. ①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7641号

文化无非你和我

史仲文 著

策划统筹: 陈卓

责任编辑: 陈卓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版式设计: 刘洁琼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70mm 1/16

印张: 29.25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033-8

定价: 4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尤西林	吴 思	吴祚来
张 柠	汪民安	李雪涛	陈晓明	邵 建
赵 强	单 纯	金惠敏	骆 爽	夏可君
黑 马	熊培云	敬文东	谢 泳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曲 辉
刘永祥	孙德辉	李志强	邹建成	张卫平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晓辉	赵姝明	袁本文	铁 军	秦志勇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象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序言】

作为一个以平生精力读书写书的人，我确实看过不少书，也写了不少书。但关注的主线还是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什么？因为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以为最要紧的事情一是自省，二是开放，三是共赢。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点都可以和文化研究发生联系，了解一个民族最恰切的途径莫过于了解它的文化，了解一个社会最深层的途径也莫过于了解其文化。文化其实就是这个民族的根，也是这个社会的密码，无论认识自己还是认识他人这都是一条最重要、也最关键性的路径。

我经常引证的一个故事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早期接触的时候，常常发生误会。写信就有误会，日本人的特点是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信的末尾，而美国人的特点则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信的开头。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习惯，然而双方都很不适应。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是太过傲慢，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而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又太绕了，一封长信读了半天，还不知所云，干脆就不读了。这样的矛盾，让双方都很受伤。于是有文化知情者建议说，为了消除误会，接到对方的信时，最好倒读，

倒着读日本人就舒服了，美国人也舒服了。

看到这个故事，也曾引起我的中国式的文化联想，我们中国人怎么写信呢？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把最要紧的事情放在开头的位置，那就太不礼貌了，没有文明古国的范儿了；但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把最重要的事情弯弯曲曲放在最后，我们也许会担心放在这么后的位置，人家要看不到怎么办呢？或者人家不重视认为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的做法，大约有两种，一般的俗人——文化不高的人会把最重要的事情端端正正摆在信的最中间的部位，既示关键又示郑重。另一些“雅人”特别是那些城府高深的官场中人，他们的做法就更中国文化了，他们把最重要的事情根本就不放在信中，而是放在信外，这叫做弦外之音。最要紧的事，我没说，但那意思有了，就看你识趣不识趣。识趣的中国人才是高深的中国人，用今天大家习惯的语言表达就是明白潜规则的中国人。

我听过这样一件事，某个大单位要搞人事制度改革，于是有上级权威人士给主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一个亲戚，在你们那里工作，知道你们要进行改革了，千万不要给你们添麻烦，不要对他有什么特殊照顾，谢谢！这样的信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他说了不要照顾了，你可以照办吗？你照办了，也许后果很严重，你没照办也许后果很轻松，何去何从，这里就有些中国文化的意思在内了。遗憾的是，很多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这样的地方，很“杯具”啊。

比写信更复杂的事则是重要的政治交往或社会交往，至少在表达形式上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古人最擅长的是游说，而西方人最擅长的不是游说，即使有游说，那一定也不居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他们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乃是讲演。游说和讲演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两种品位。中国人的游说可谓源远流长，而且功夫极深，用心极苦，一些著名的游说词，完全可以称之为千古文章。但因为它是游说很多内容已湮没无可考，即使它重要，我们也无法确知其内容了。比如孔子，他一生周游列国两次，游历对象主要是国君，用的方法就是游说，但说了些什么，几乎全无可考。《论语》上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游说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它的两个基本特点是：第一，它的对象是最

高权威，而最高权威只能是一个人；第二，它的表达方式是生发于密室之中，只限于说者与所说者二人之间。这和演讲完全不同。演讲一定要大庭广众之下，即使不是大庭，也一定是一个公共平台；即使不是广众，也绝对不是私密化的。

在古代，西方有古希腊，中国有春秋战国，那个时候的大改革家在希腊有梭伦，在春秋有商鞅，但他们的做法全然不同。商鞅的改革显然更具深度和广度，然而他始于游说；梭伦的改革却是公共性改革，他的第一表达就是演说。中国先秦诸子，可谓个个都是游说高手，或许换个角度考虑他们中既有致力于游说君主的人，也有致力于办学的人，二者或有交互，但总体上看，只有那些游说者可以成为政治明星，可以对当时的政治时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样的传统连绵不绝，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证应该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这恐怕和《三国演义》的传布有某种关系。《隆中对》也是只对一个人讲的，那就是刘备。别的人呢？无须管他们。关张晓不晓得《隆中对》，存疑。荆州的百姓和士卒一定不知道这秘密，蜀汉的军人和民众恐怕就更知道了。中国人主张游说，而且把它限于极其狭小的空间，因为不管你是儒还是非儒，大家都一条心地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两年传播很广的一个清末文化话题是，当中英军队在虎门开战，英国军舰穿越虎门炮台进入珠江，一个令人惊骇的景象是珠江岸上有数万民众旁观，他们似乎在看一场戏，好像这战争与自己全然无关。几个月后战争移至厦门，英国大使向厦门守军提交战书，又有数万人在岸上围观，同样像是在看一场人间的话剧，同样是表现出全然与自己无关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还被英军打了两炮。事情过了2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占领了安定门，又有数千民众上街围观，看大鼻子西洋镜。据有关文献记载，维护秩序的清兵都有些力不从心，挡不住这些民众的好奇心。

这样的表达显然是一种文化表达，而这种文化表达决然不使我们感到自豪或者光荣。很多人指责那时候中国人的黑暗和愚昧。但我以为，这样的愚昧显然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内在性的联系。民众和朝廷处于全然

绝缘状态，或学术化一点讲是一种分裂型结构形态，他们中间没有沟通的线路，在这样的状况下，专制的政府必定催生冷漠的人民。

虽然如此，但这样的例证并不能证明中西文化整体的优与劣，就其发展阶段而言，却有快慢之别。中国文化的第一要务是需要认真的自省。自省不是妄自菲薄，不是专门拿我们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比，不是如某些人讽刺的那样硬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自省是说要找出我们的不足。我听某一位评论员说过这样一句话：感谢上帝，它赋予了人类死亡。这话说得很高明，人类如果没有死亡，那一定不是人类的大幸，而是人类的大不幸，起码是这个地球的大不幸。把这意思用于文化，我们也可以说凡文化都有短项，这是它的幸运，因为有短项，所以才有更广阔的历史发展空间。所以，自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找出问题，意在发展。

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我这里想择要而言，举三个证明。

第一个证明，西方文化的最大历史问题在于它的外部歧视，而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内部等级制或曰内部歧视。

先说西方文化的外部歧视。我们很多中国同胞喜欢谈论古希腊的民主，不错，自由、民主、平等与幸福，在古希腊应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范畴和文化理念。这一点确实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然而，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品性是这些重要的理念，只限于它所认可的社会内部、民族内部或阶层内部。比如古希腊，雅典民主是最典型的，但它绝对不适用于奴隶。那些最杰出的政治领袖或思想家，在维护奴隶制这一点上并无不同。而且这些理念也一定不适应于希腊民族以外的民族，例如波斯人或者印度人。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了多年。

西方文化可以说由三大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文化。前边说过，它不曾克服对外歧视。二是古罗马传统。古罗马传统为后人公认的有三个遗产，一是罗马法，二是拉丁语，三是以雕塑为代表的艺术品。但即使罗马法，依然保存了对外歧视这样的文化品格。第三个传统是基督教。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主张博爱的一种宗教文化，但我要说真正读过《旧约》的人都会知道，《旧约》的立论之一是认定犹太民族是上帝选民，狭义地说，犹太民族为上帝的唯一选民；即使广义地理解，犹太民族依然为上帝的优选民族。

这样的观点就决定了基督教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歧视和信仰歧视。《新约》与《旧约》有不同，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改变，从而更其强调上帝的唯一性和万能性，更其强调博爱精神和普世精神。但作为一神教它仍然有非常强的外部歧视特征，最重要的历史表现就是不允许异教徒的存在。所以才有对古希腊文化的毁坏，才会产生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形态，才会有十字军东征那样野蛮残暴的历史行为。

这种文化表达在文艺复兴以后依然存在，不仅存在于传统的天主教流行的国家和领域，也广泛存在于新教流行的国家和地区。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文化品性在经历了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这三大革命之后依然未见改变。

英国人在17世纪之后应该是最先进的国家，不仅经济上有最先进的科技做主导，而且文化上也有最先进的理念做旗帜。但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一点都没有体现出他们所宣扬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和博爱精神。法国人也是如此，法国是经过了启蒙运动的，又经历过法国大革命，还有过拿破仑法典。然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行为和他们的这些经历相和谐、相匹配吗？那些在北京城横行，在圆明园纵火，对中国皇宫进行肆意掠夺和抢劫的人，他们就没有受过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熏陶吗？他们就没有接触过洛克的自由主义吗？他们就没有读过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作品吗？他们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另类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吗？显然都不是。

还有美国，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最年轻也是最先进的国家，它立国的基础就是平等、自由和幸福，这是在独立宣言中宣誓过的，也是写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完全可以称之为美国的立国精神与宪政本质。然而美国对黑人的奴役却是世人皆知，美国的黑人奴隶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才得以解决。而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直到此后的百年后——20世纪60年代，才算真正得以解决，并且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包括牺牲了伟大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对外歧视的极端发展还会产生更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例如希特勒的民族优劣论。民族优劣的理论其实是纳粹的根本理论基础之一，它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就是对整个欧洲的践踏，就是屠杀了超过600万的

犹太人。这种种族大灭绝式的疯狂行为，细细想来，也有其必然的文化渊源。我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定会产生纳粹，但我可以说纳粹产生的土壤显然和这种文化的某种基因密切相关。

西方文化属于外部歧视型，中国文化则是典型的内部歧视型。我们中国人对外历来是宽和的、礼貌的、友好的，甚至在很多时候其表达还有些软弱。我们很喜欢和一些少数民族和亲，这样的历史在先秦时期其实就初见端倪。例如秦晋之好，晋是中原大国，秦是边夷国家，但没有关系，依然可以和亲。汉代以后表现更突出了，因为汉代的和亲出现了杰出的女王昭君，因为唐代的和亲又出现了一位同样杰出的女性文成公主。我在某个地方说过，中国文化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对其他民族的民族歧视，或者种族歧视。我们完全不歧视与我们肤色不同的人，而且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在肤色的表达上绝对是多元的。我们不歧视黑皮肤的人，张飞的皮肤就很黑，尉迟恭的皮肤据说也很黑，包拯的皮肤更黑，我们对它们有歧视吗，不但不歧视黑的，就民族戏曲的脸谱表达看，各种颜色都不歧视。不仅包括黑皮肤的还有红皮肤的、黄皮肤的、紫皮肤的，甚至蓝皮肤的，一概都不歧视。鲁迅曾说，“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这些不同的肤色，只不过是不同的性格符号罢了。

中国人的民族歧视其实也非常罕见，甚至并不存在。汉武帝是有雄才大略的人，也是对北方少数游牧民族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生猛的人，但他临终的时候所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中就有一位金日磾，金日磾真真切切就是一位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人物。

我在某个地方说过，在几乎全世界的范围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受到歧视，但中国人并不歧视他们。不但不歧视他们，犹太人在宋代时期就曾来到当时的都城开封，并且有很好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异类同样持有宽容甚至友爱的态度。中国古老神话故事中有一则《白蛇传》，《白蛇传》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可以说从古代传奇一直到香港电影，不但流传千年而且几乎遍及所有剧种。但白蛇不是人啊，青蛇也不是人啊，但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站在许仙与白蛇的美好爱情一边，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异类而有所歧视。还有著名的文言经典小说

《聊斋志异》，那里边的每一位女性实在是太可爱了，但其中的多数却是狐仙鬼女，作为一个男性如果能与这些狐仙鬼女相遇真是莫大的幸运。这些异类都是女性，孙悟空则是一个男性，他虽然是一个猴子，但中国文化并不歧视他。中国人更喜欢称呼他“齐天大圣”。

但中国文化的对内歧视确实非常严重非常惨烈非常畸形。别看很多统治者对外和风徐徐，转过身来对内却完全不同。例如西太后在1900年庚子之变，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宴请各国公使夫人，这些人对西太后的印象非常好，给过她很高的评价。但她对中国人呢？对她的大臣和她的臣民呢？不仅不是慈祥的，不是和善的，不是宽容的，而是非常粗暴和残暴的。正所谓面对列强，善为菩萨；驾驭臣民，惯作魔王。近些年，颇有些学者惋惜西太后的宪政计划没有得以实现，依着他们的逻辑，如果这位太后再多活十年、二十年中国就可能走上宪政改革的道路从而避免后面的很多战争和动乱，这样的道路真是太诱人了。但恕我直言，历史并不能假设，这样的道路是没有的。宪政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宪政的关键在于宽容和接纳反对派，特别是宽容和接纳极端反对派。就西太后那个时代讲，就是宽容和接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这一点慈禧太后能够做到吗？那些认定宪政可以实现的人能给我们一点证据证明她可以做到吗？我以为她不能，所以那个时候的宪政之路本质上乃是伪宪政改革之路。

中国人的对内歧视用最简单的话表达就是官本位和等级制。旧时的启蒙读物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为什么会高呢？因为读书可以入仕，学而优则仕，那就是做官了。做官在古代中国是世间一切事物中最为荣耀的事情。只有做了官才可以衣锦还乡。除去官之外，即使你是最豪富的商人，你也无法衣锦还乡，因为在汉代时朝廷就明文规定，商人出行不可以乘马，也不可以坐牛车，后世又有朝代规定，为昭示商人的身份，他们需穿两条裤腿两种颜色的裤子。这样的待遇，怎么能衣锦还乡呢？商人没有地位，农人与工匠同样没有地位，比如《水浒传》里的武大郎，真正可以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个代表，然而那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人可以欺负他。官人可以欺负他，强人可以欺负他，恶人可以欺负他，连同类的穷人都可以欺负他。劳动者

没有地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是中国传统等级制最悲哀的结果之一。

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其实不确，中国古代社会并非人治，而是礼治。礼治的基础就是等级制，虽然它的理想乃是人治。孔夫子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中，仁者爱人和仁政理念乃是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但基础是礼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且中国的礼治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朝野无论贫富无论城乡，都是如此。中国的礼治从出生一直到死亡，是一而贯之的。孔夫子本人就身为表率，他最钟爱自己的弟子颜回，颜回不幸早夭，夫子悲痛欲绝，但颜回的父亲要求以更高的规格埋葬自己的儿子，孔夫子表示不同意，因为那样做不合乎礼。

官本位与等级制严重扭曲了人格，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不是人上之人就是人下之人，而绝对没有平等的人。皇帝和皇后可以平等吗？皇族和贵族可以平等吗？贵族和平民可以平等吗？主人和奴仆可以平等吗？丈夫和妻子可以平等吗？父亲和儿子可以平等吗？都不可以。在西方文化中，调剂人际关系的很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爱，爱是双向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调剂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和情感规范却是单向的、倾斜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儿子对父母讲的是孝，这就是单向的，因为只可以说儿女孝敬父母，绝对不可说父母孝敬儿女。臣民对于君王讲的是忠，这也是单向的，臣子要忠于皇帝，却绝对不可以主张君王忠于臣子，妻子对丈夫要尽节，有权有势的丈夫却可以妻妾成群，这也是单向规则。所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伦理理念和规范中的忠孝节义，都与平等无关，即使是一个义字也是等级化的。义的本意是安守各自的本分，宋江可以讲义气，但皇帝可以讲义气吗？不可以。宋江如果做了皇帝，义气就会决然离他而去。就是他没有做皇帝归顺了宋王朝，做了一个并不很大的官，为着给这朝廷尽忠，在被毒死之前，还亲自把李逵招来，让他和自己一块赴死。

中国的等级制几乎就深入骨髓，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能体现自由和平等精神的，应该是《红楼梦》，然而那也是一种朦胧的体现，并没有达到真正自觉的程度。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看到很多画册，那画册是有等级的，正册上的女性都是主子，即便那主子很

坏，坏也要入正册，因为那是她身份的体现。低一等的即所谓的妾就要入副册，再低一等的连妾也做不上的或者欲做妾而不得，就要入另副册，例如晴雯，袭人等等。

《红楼梦》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两个，至少让我惊异不止。一个现象出在林黛玉身上，林黛玉一心爱宝玉，引起多少追求自由婚姻的男女的共鸣，因为这爱，她嫉妒宝钗也曾嫉妒湘云，或许可以说嫉妒一切有可能爱上宝玉的女性。而其实不然，她嫉妒宝钗但不嫉妒袭人，有一个回目上说，她口口声声喊袭人嫂子，愿意袭人尽心关爱宝玉，并且半点妒意皆无。她不妒忌袭人，也不妒忌晴雯，为什么？因为在她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和她们在人格等级上有区别。她们不值得她嫉妒。另一个情节是关于晴雯的，晴雯是大观园中受冤屈最深最重的一个非常能干耿直美丽的丫鬟，在我年轻时她是给我感动最多的《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然而她又是最遵守传统道德的人，她虽然钟爱宝玉，但不曾与宝玉有染，她痛恨一切反道德的行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发现小丫鬟坠儿有偷窃行为时，就拔出头上戴的簪子非常凶恶地惩治了她。一个受压迫的奴隶，遵守了清白的信条，却又被人诬陷而死。一个命途多舛的丫鬟要以同样暴力的手段惩治更小的奴隶，这样的悲剧实在令今人无言。

《红楼梦》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所反映的人物属于各个阶层，这些阶层就包括主子之上还有主子，奴才之下还有奴才。过去说人分十等，等等有别，其实不只十等，故民间有上九流下九流之分，那就是十八等了。其实也不止十八等，赖大本是奴才，但他又是主子，贾赦本是主子，但在皇权面前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奴才。所以我常说一个七品知县就可以成为百姓的父母官，但在皇帝面前不过是芝麻官。一个芝麻都可以成为父母，可见中国底层人民地位卑微、人格渺小。

最为遗憾的是，这种官本位和等级制的文化影响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消除，虽然没有人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话了，但看每年的“国考”有那么多年轻人蜂拥报名便可知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文化转型真的是任非常重，道非常远。

比较中西文化的这两个特点，可以知道双方的交流非常困难，所以

已故美国著名文化学家亨廷顿写过一本《文明的冲突》，文明有差异必定有冲突，但不一定就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事实上它可以变成零和游戏，也可以双输还可以双赢，用封闭的方法对待对方就会双输。中国历史的发展凡封闭必失败，有人以为西方人是不封闭的，一贯开放的，这我也不完全同意，我看很多西方人他们的心理歧视也是很封闭的，因为他们并不认真对待异国和异族文化，并不能真正地虚心了解这些文化，读这些民族的典籍，理解他们的价值和追求。负面的交流方法是用各自的劣性对待对方，其结果必定双输。正面的交流方法是吸纳对方的长处以他山之石攻玉，其结果就应该是双赢。

西方文化经过千年的蜕变，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的蜕变，终于改变了外部歧视的方向，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我以为摆在西方文化面前的，有三个重大课题：种族课题，民族课题和异质文化课题。第一个课题已经解决了，其标志就是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黑人可以做总统，是林肯时代的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是马丁·路德·金时代的美国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符号，它证明西方文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品质性提升。第二标志是欧盟，西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国家问题三者纠缠不清，历史上的欧洲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因为这三大问题的纠缠与冲突付出过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生命代价。但欧盟是一个标志，证明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虽然现在欧盟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欧债危机一类的重要问题，但我相信欧盟可以成为样板，而这个样板的成功则标志着人类文明可以走向大同之路。第三个标志就是以文化标志，也就是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明能否与伊斯兰文明或诸如中国式的儒学传统文明达到真正的共存共荣与双赢，不仅是对各种文化的考验，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考验。

中国文化也同样有三道门槛需要跨越。一是必须从官本位文化蜕变为公民文化；二是必须从等级文化蜕变为民主文化；三是必须从礼治文化蜕变为法治文化。这三个门槛跨过去了，就无异于凤凰涅槃、古老文明的辉煌再生。

我坚信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可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因为

从本质上讲它们具有同样伟大的内在性品格。多年前就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一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最好的世纪将是各种不同的文明共赢的世纪，而最不好的世纪则是这些文明无法共存的世纪。何去何从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类成员做出认真、明智和严肃的选择。

第二个证明是社会生活层面的，在这个层面中西文化也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文化可以概括为生活理性，西方文化则可以称之为理性生活。

先说中国人的生活理性。生活理性是什么意思？在位序上讲就是首先重视生活，重点重视生活，甚至核心都属于生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一个老外看点栏目，一位中国名字叫杜博的法国友人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中国文化，第一个词就是生活。中国人实在是太会生活了，最近的一个影视例证就是《舌尖上的中国》，这个题目首先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性视点，而且名字也起得十分雅驯，这就更中国文化化了。如果你简单的说中国人好吃，那不符合实际，那不算会生活，会生活的中国人不单非常重视吃穿住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要吃得非常讲究，一直要讲究到如诗如画的程度。

中国人的生活能力还表现在他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找到生存的资源、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诗意。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依着西方人的标准完全可以列为不适宜人类居住区，但我们的祖先祖辈辈就生活在那样的地方，而且活出许多精彩出来。我有一个年轻朋友，去美国做交换学者半年，他的一大感受是美国人不会吃，那吃法太单调了，中国即使是很贫困的家庭也会在饭菜上翻新出许多花样，这一点美国人办不到，英国人更办不到。例如中国的菜名很多都是非常诗情画意的，例如四喜丸子，麻婆豆腐，佛跳墙，蚂蚁上树，松鼠桂鱼种种，这些菜名都可以给未曾吃过它的人以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最近听说要把这些菜名翻译成英文，结果遇到了麻烦，译得太直白了不行，比如麻婆豆腐，太直白则丑陋了；译得太写意了，似乎也不行，比如把四喜丸子译成四个快乐的肉团，结果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中国人的这种情趣，其实不仅表现在食物上，还表现在各种艺术品上。例如中国画，它的对象非常广泛，青蛙可以入画，乌龟也可以入画，